研究人员称，南非重设计啤酒税每年可避免1,900人死亡

研究人员认为，财政部提议的啤酒税档跨度过大，难以推动生产商开发低酒精度产品，也使有害饮酒更难遏制

2026年11月19日星期四



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和开普敦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酒精与南非全部死亡病例中的3.7%有关。他们于11月18日周三指出，南非应重新设计啤酒税制，以更有效地减少有害饮酒。

研究人员在一场有关酒精政策的媒体圆桌讨论会上，介绍了《202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发现，以及另一项独立建模研究的结果。他们表示，酒精在南非造成约10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相当于该国疾病总负担的3.3%。

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疾病负担研究部门高级专职科学家、开普敦大学荣誉高级讲师Annibale Cois博

士表示，公共讨论往往过于狭隘地看待酒精对健康的影响。

他说，酒精与多种疾病有关，包括心血管疾病、神经精神障碍、癌症及其他慢性疾病，其危害远不止公众通常所认为的饮酒会损伤肝脏。

这场讨论正值南非国家财政部继续审查酒类消费税之际。研究人员表示，现行提案的结构，尤其是啤酒税部分，税档跨度可能过大，不足以鼓励生产商降低主流产品的酒精含量。

一项名为《减少南非酒精消费所挽救的生命与避免的疾病负担》的研究，由开普敦大学应税消费品经济学研究部门和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开展，考察了不同啤酒税制可能如何改变饮酒模式和公共卫生结果。

在研究人员模拟的最强干预情景下，啤酒消费量将下降15.7%，纯酒精总消费量将下降8.5%。他们估计，这种变化每年可避免约1,900人死亡，并每年增加超过91,000个健康生命年。

啤酒是这场讨论的核心，因为它约占南非纯酒精消费量的54%。因此，啤酒税制的任何调整对公共卫生政策和饮料行业都尤为重要：不同的税制设计最终可能影响定价、产品配方以及啤酒生产商之间的竞争。

开普敦大学应税消费品经济学研究部门首席研究官Nicole Vellios博士表示，酒类消费税应主要被视为公共卫生工具，而非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她表示，需要定期提高税率，因为如果税收调整仅与通胀挂钩，而家庭收入持续增长，酒精随时间推移可能变得更加负担得起。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名义税额有所增加，消费量也可能不会下降。

研究人员还对财政部提出的啤酒税档提出质疑。根据该提案，啤酒将按两个酒精度阈值征税，分别为2.5%和9%（按体积计）。Vellios表示，这种做法会使南非销售的大多数啤酒——酒精度通常为4%至6%——都落在同一税档内。

研究人员指出，这几乎没有给啤酒生产商降低酒精度的动力，因为典型产品必须将酒精度降至2.5%以下，才能适用较低税率。Vellios表示，这与目前大多数产品约4.5%至5.5%的酒精度相差很大。

研究人员提出的替代模型将设定更细的税档，阈值分别为2.5%、3.5%和4.5%。他们认为，这些税档能为生产商创造更强的激励，促使其开发酒精度较低、同时更贴近主流消费者偏好的啤酒。

这场讨论的意义不止于税收政策。如果南非采用更细的税档，啤酒生产商可能面临调整现有品牌配方或扩大低酒精度产品供应的压力，零售商和消费者也可能看到高酒精度与低酒精度啤酒之间出现更大的价格差异。这项调整尚未获批，财政部的咨询程序仍在进行中。

研究人员还考察了酒精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在其模型的最强干预情景下，他们估计每年可避免约66起与人际暴力有关的死亡，并减少超过4,044个与暴力相关的伤残调整生命年。

他们表示，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仅靠税制改革就能制止性别暴力或其他形式的人际伤害。但他们认为，减少有害饮酒能够为更广泛的暴力预防工作作出实质性贡献。

SAAPA SA活动主任Nomcebo Dlamini表示，酒精滥用造成的影响往往由饮酒者以外的人承受，尤其是女性、儿童和其他处境脆弱的家庭成员。她说，公共讨论常常只关注饮酒者本人，忽视酒精对家庭和

社区造成的更广泛伤害。

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疾病负担研究部门主任、开普敦大学荣誉教授Richard Matzopoulos教授表示，如果讨论只关注酒精行业带来的就业、销售额和税收收入，酒精危害造成的经济成本往往会被低估。

他说，最大的损失来自过早死亡和健康生命年的损失，而非仅仅是政府或正规经济部门的直接支出。他还表示，在全人群层面减少酒精消费的努力常会遭遇阻力，因为这可能损害行业利润。

南非国家财政部在《2026年预算审查》中表示，酒类消费税的相关磋商将在年内继续进行。因此，政府是否会保留现行提案中跨度较大的啤酒税档，还是考虑研究人员支持的更细税档，仍有待观察。